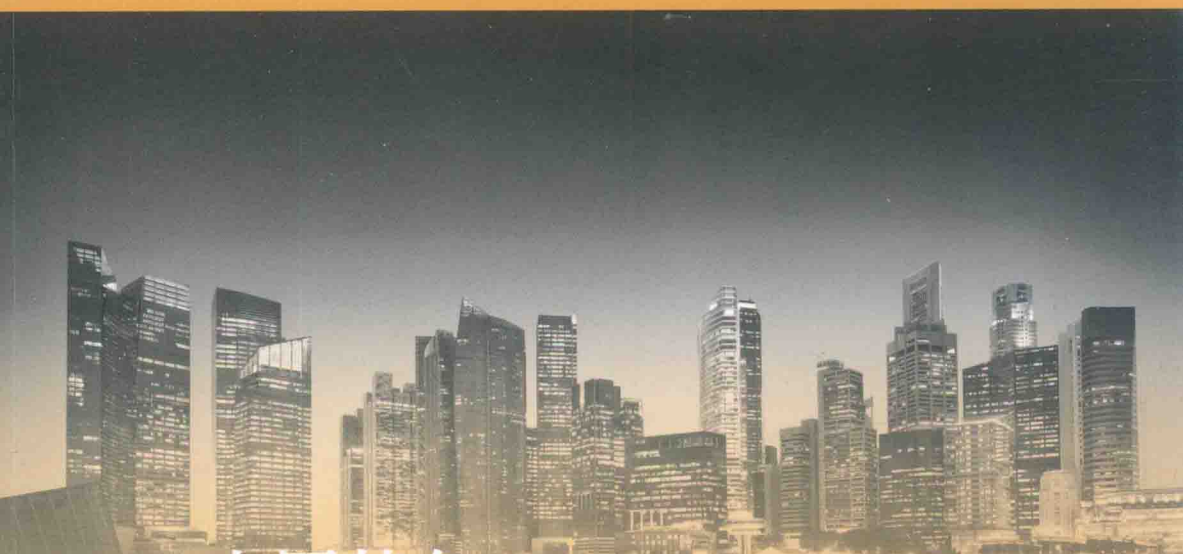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

胡玉鸿/主 编
宋言奇/副主编

城镇化与城乡治理

CHENGZHENHUA YU CHENGXIANG ZHILI



中国特色 城镇化研究报告 2013

政府软实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维稳困局的破解
论环境话语权力的运行机理及场域
困境与创新：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府际合作
城乡一体推进环保事业的机制探索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制度创新研究
苏州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路径初探
江苏城镇化进程中产业转型的探讨
论城镇化进程中环境维权的衍生与应对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

胡玉鸿/主 编
宋言奇/副主编

城镇化与城乡治理

CHENGZHENHUA YU CHENGXIANG ZHILI

中国特色 城镇化研究报告 2013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镇化与城乡治理: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报告:
2013 / 胡玉鸿主编.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672 - 1152 - 0

I. ①城… II. ①胡… III. ①城市化—研究报告—中
国—2013 IV. ①F299.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2193 号

书 名: 城镇化与城乡治理——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报告 2013

主 编: 胡玉鸿

副 主 编: 宋言奇

责任编辑: 周建国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印 装: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5 字数: 207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152-0

定 价: 35.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序 言

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的环节众多。城乡治理就是城镇化中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城乡治理的效果,决定了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与可持续性程度。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因此城镇化对城乡治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尤其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对城乡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期待。

为了更好地完善城乡治理,进而推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我们编写了《城镇化与城乡治理》一书,并设立城镇化与城乡治理理论、城镇化与城乡治理主体、城镇化与城乡治理领域、城镇化与城乡治理问题、城镇化与城乡治理地方经验、短论等6个章节,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全面探讨,以求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尽微薄之力。

目 录

城镇化与城乡治理理论

- 政府软实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维稳困局的破解 张劲松(3)
- 论环境话语权力的运行机理及场域 沈承诚(16)
- 城镇化模式的人本化重塑:基于风险社会视域 张振波(27)
- 人的城镇化的现代性维度与建构
- 基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方法论剖析 邹慧君(34)

城镇化与城乡治理主体

- 困境与创新: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府际合作 郭彩琴 卓成霞(43)
- 城镇化加速时期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政府与市场互动耦合驱动
- 朱喜群(56)

城镇化与城乡治理领域

- 协同推进与全面发展农民集中居住系统的功能分析及其优化 叶继红(71)
- 城乡一体推进环保事业的机制探索 宋言奇(81)
-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制度创新研究 叶战备 王生坤(87)
- 日本城市化发展与轻轨交通研究
- 以阪急电铁为例 黄腾 姚传德(94)

城镇化与城乡治理问题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三重困境:结构约束、市场失灵

与转型悖论 袁建军(103)

新型内生城镇化进程中的保障房建设与城中村改造:模式、问题与出路

..... 贺小林(113)

城镇化与城乡治理地方经验

社会政策范式转型理论视域下的苏南城镇化发展路径 梁君林(125)

苏州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路径初探 吴莉娅(134)

江苏城镇化进程中产业转型的探讨 朱 妍(145)

短 论

精英回归与聚集:江南新型城镇化文化绵延之路 张劲松(157)

论城镇化进程中环境维权的衍生与应对 沈承诚(161)

敬畏自然与历史:新型城镇建设的基本原则 聂保平(164)

社会管理、“软权力”与大众传媒功能的优化 沈承诚(167)

生态农产品城乡合作对接是驱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支点 苑 丰(171)

不要放大社会冲突事件背后的公民政治改革诉求 张振波(176)

城镇化与城乡治理理论

政府软实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维稳困局的破解

张劲松

【摘要】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未来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而在建设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政府维稳的艰巨性,使政府陷入“投入倍增而收益递减”的困局。维稳过程中的压力型体制,迫使地方政府运用最得手也是最能见竿见影的硬实力方式维稳。维稳的硬实力运作机制,最初是有成效的,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利益的进一步分化,政府维稳硬实力的“软”呈现出来,政府常规硬实力维稳出现了失灵。政府运用软实力来维稳,具有很大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运用软实力维稳,投入少而收益多,软实力运用得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其“硬”的一方面。因此,为了破解维稳困局,政府要积极稳妥而又创造性地运用软实力。

【关键词】 政府软实力 新型城镇化 维稳困局 破解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研究”(GJ213103);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地方政府与社会管理”资助。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未来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大结构性问题的关键,其面临的挑战也很多。新型城镇化道路,既打开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门,也将本已累积的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政府维稳压力进一步加大,甚至有的地方维稳压力已达临界值,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当前政府维稳的成效不如人意,甚至出现维稳“投入倍增而收益递减”的怪象。破解当前维稳困局,要从加强政府软实力建设着手。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著名国际战略思想家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一书中指出:“何谓软实力?它是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运用软实力破解维稳困局有着重要意义。

一、陷入困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维稳投入倍增而收益递减

21世纪,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它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同时,它的

复杂性也带来了大量的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政府维稳的艰巨性

1.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已被公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两大驱动因素之一”，它在建设过程中的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摸索性。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了中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大变革阶段，此时“国外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化理论难以直接引进并加以应用，国内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发展理论也难以适应新的发展，所以城市化进程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在大变革时期，各地方政府所推进的城镇化，没有固定的模式，甚至大多数地方连城镇化的总体规划都没有，即使有，“规划赶不上变化”，中国城镇化道路不免陷入了盲目发展中。“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城镇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大量“鬼城”的出现昭示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失败。即使一些较为成功的，其城镇化仍然不免存在着亟须解决的大量后城市化的问题。

其二，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快速性。自1978年以来，仅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内，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中国经济的持续并快速的增长，拉动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向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幅度的拓展，又将原来城市周边的乡村圈入城镇化进程中。工业化、城镇化、农民的市民化，在各种“化”的过程中，大量的乡村在短时间内被“化”掉了，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奇异的过程。它就发生在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它牵引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化的经济向前发展。中国的城镇化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已经成为一个超越国家而引发全球关注的大事件。

其三，新型城镇化问题具有累积性。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管是有关大自然的问题，如空气污染、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矿藏枯竭，还是有关社会的问题，如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病、强征农地、城乡二元化、城镇人口老龄化，所有这些问题，都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跳出来的。这就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问题累积的结果。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是在几百年时间内自然形成的，是经济发展之后，社会人口和社会结构能与之相适应；然而，在中国，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新型城镇

化进程,均与西方国家不同,它的发展太过猛烈。西方国家城市化在其自然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逐步”解决;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前面的问题还未来得及解决,新的更难的问题又出现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维稳的艰巨性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这就决定了政府维稳的艰巨性。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摸索中的城镇化道路一旦决策失误,对某些地方来说,危害可能是毁灭性的。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报告中称,一些地方借推进城镇化之名,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率,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超前规划各种工业园区、开发区和新城区,缺乏产业支撑,造成很多“空城”,占地过多。城镇化道路错一步,维稳任务将增十分。当前一些地方盲目城镇化,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多重灾难,这种灾难不仅是目前的,有的还将危害一方很多年,甚至有的危害是永久性的。

其次,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与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政府维稳的艰巨性。“2000—2011年,我国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总人口50.5%的增速,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10万亩以上,但开发强度普遍偏低,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1以上。”中国城镇化过于注重速度,不太重视质量,人的舒适度、发展和健康需求、生态环境等,都没有成为城镇化重点追求的目标。城镇化不仅是造城建镇,更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好大喜功式的城镇化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大而空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中,用于人的发展的资金有限,造成了城镇排斥人的现象,大量的农民工建设了城镇,而其自身哪怕在城镇工作奉献了大半辈子,最终也“化”不进城镇。政府解决人的问题的能力有限,这正是导致维稳工作成为各地头等大事的重要原因,维稳变成了“搞掂”,只要人不生事,就是“稳”。

最后,城镇化进程中不断累积的问题,尤其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已超出了部分地方政府的解决能力,能力与责任之间出现了反差,地方政府维稳的能力受到质疑。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因产业结构较为落后,企业发展乏力,所以资本流入较少而流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城镇化,往往就是一个外壳像“城镇”的钢铁森林而已。政府在造城方面下功夫多,在解决就业和社会服务上能力不足,“城市居民来自于不同阶层,经济等级差异往往会瓦解,进一步的结果就是城市中政治运动的大量兴起以及多个利益主体的不断出现”。多个利益主体的出现及其利益的争夺,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要满足全体利益主体的诉求,这

已超出了许多地方政府的能力。维稳事关重大,维稳能力不足,两者的失衡导致难以达到地方政府维稳的目标。

(二)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维稳的艰巨性导致投入倍增而收益递减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维稳任务艰巨,而在现有的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维稳的运作机制导致了投入倍增而收益递减的困局。压力型体制主要包括三个要素结构:(1) 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2) 各部门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机制;(3) 物质化的多层次评价体系。政府维稳困局主要是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产生的,其生成机制如下:

1. 政府维稳任务的分解与维稳成效

在城镇化进程中,当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时候,各地在制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接到上级任务后,党委和政府把它们进行量化分解,通过签订责任书的形式层层下派到下级组织以及个人,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维稳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维稳的终极目标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长治久安及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稳的政治性是首要的。维稳要确保基本政治制度长期持续和社会政治秩序的长期稳定,这就是维稳的刚性,它没有任何可缓冲的可能,“这种稳定以垄断政治权力为目标,以僵硬稳定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它的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第二,‘刚性稳定’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制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压制或打击;第三,‘刚性稳定’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依赖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控制,具有非程序的法制性。”

维稳的刚性说明,城镇化进程中逐层分解的任务,其重心是任务具有政治性。“稳定压倒一切”其中最主要的内涵是“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任务的政治性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维稳内容的群体利益性交织在一起,以经济为中心的群体利益的分配,最终与政府维护政权稳定直接挂钩。而解决群体利益冲突的手段,自然而然与政权稳定的政治性挂上了钩。经济利益冲突上升为政治问题。经济利益冲突的解决就是经济性的,是要考虑成本的,而政治问题的解决则往往是不计代价的,因而最终政府维稳常常不计代价,这是政治维稳成本倍增的重要原因。

2. 政府维稳运作的共同参与与维稳成效

政府解决稳定问题的共同参与机制包括两种,“一种是各部门的工作要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计划和工作重点进行安排,这是纳入下级工作计划的常规方

式;另一种是各部门抽调人员或者整个部门一起行动,完成来自上级的临时性任务或工作”。维稳的共同参与机制主要是在上级政府的压力下进行的,维稳任务按属地原则分配。但是,新型城镇化发展起来后,人员的流动加大,新市民因户籍制度原因,其管辖权仍在户籍所在地,而其生活的城镇才是他们最主要的甚至是长期的活动区域。离土不离乡的许多农民工,有的离土超过20年,除了逢年过节偶尔回乡之外,几乎与本土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按照属地原则,原户籍地跨区域维稳的任务十分艰巨,其成本自然而然地倍增,而收效往往甚微。

3. 政府维稳评价的多层次与维稳成效

分解任务与评价任务完成情况,这是政府行政的两个重要内容。作为政府行政之一的政府维稳也是如此,除了分解维稳任务以外,任务分解后的执行情况如何,也是政府的常规工作。对于任务完成状况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予以奖励;反之,将予以处罚。奖励常与晋升挂钩,而惩罚往往实行“一票否决”制,即只要有一项维稳的目标未达到,将视其全年的工作绩效为零,且危及单位领导人的晋升。分解任务及评价任务的完成的主体,不仅仅是上一级行政机关,还包括党的领导机关、人大、政协、政府的所有上级机关,这些机构几乎都可以以“一票否决”制来要求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做好各种各样的维稳工作。在如此多层次的评价体系下,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不敢对任何一项维稳指标掉以轻心,其所能做到的工作就是拼命增加维稳成本,保证在自己任期内不出大一点事故。至于维稳的成效到底如何,则无从得知。有一点却是大家熟知的,那就是中国维稳成本已超出社会保障支出,也超出了中国的国防开支,维稳工作正在以高成本运行着。

二、硬实力的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维稳常规手段已失灵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维稳任务的艰巨性,在维稳运作过程中的压力型体制,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地方政府运用最得手也是最能见竿见影的硬实力方式维稳。维稳的硬实力运作机制,最初是有成效的,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利益的进一步分化,政府维稳硬实力的“软”呈现出来,政府常规硬实力维稳出现了失灵。

(一) 政府政治硬实力支撑理论的现实之软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按照马克思主义指引,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是政府维稳最强大的硬实力。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政权力量用于维稳,常常表现为有力无处使,即使偶尔使用了,也容易陷入收益少、负面影响大且

成本巨大的困局。究其原因,主要是支撑政府政治硬实力的理论在城镇化建设中存在软肋。

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主要由马克思主义支撑着,中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理论上讲,“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求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中国,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府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按照阶级统治理论,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是统治阶级,而被统治阶级越来越少。在被统治者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统治者的统治权就较难看得到或摸得着,因为人人都是统治者,所以无所谓统治与被统治的问题存在了。

当前,城镇化进程迅猛,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稳定问题其性质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政府政权硬实力不便于用在人民内部矛盾上。而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刚性维稳压力下,地方政府对于一些常规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上纲上线,如“上访就是不稳定”“群体性事件就是不稳定”,并提出“搞掂就是稳定”。为了表面上的稳定,不惜动用专政力量、暴力工具,强行压制公众诉求。表面上表现为有硬实力,事实上的结果是效力低而成本极高。

一方面,政治合法性的支撑理论无法用来指导具体的维稳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又是如此迅猛,问题出现得突然且复杂。在没有产生适宜的理论指导当前政府维稳工作时,常规的政权力量在面临复杂的维稳任务上,表现出了治理的失灵。对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创新,以解决亟待解决的维稳困局。

(二) 政府经济硬实力运用机制的现实之软

“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是政府维稳最常见的经济硬实力的表现,在社会稳定因素不常见的时期,人民币的确较容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这一运用机制运用至今,已表现出了其软弱性。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运用经济硬实力维稳,最主要的现实之软,表现在投入的资金倍增而成效递减。

中国摊大饼式的城镇化道路,导致了利益冲突的加剧。“政府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需要,非法征地和暴力拆迁,各类项目急于上马。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开始成为利益主体,并围绕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展开博

弈。”城镇的扩张,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其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城镇化早期,政府运用人民币来维稳,效率还是较高的。但是,随着利益主体的“学习”能力增强,维稳事件中人民币的量不断翻番,且上一次维稳的人民币的量,被利益主体“学习”后,很快被作为维稳事件的“基数”,再创“新高”才能满足利益主体的期望。

发达地区的经济硬实力还比较“硬”,支付高额维稳成本时,大多数时候还能挺得住;而中西部地区,因经济实力较弱,而利益主体经过“学习”后,在我们一再强调的社会“公平”“平等”“正义”理论的指导下,维稳也得“公平”。如“同命同价”,既然温州动车事件的赔偿标准是90多万,同命同价,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命”都得有90余万的补偿才行。理论上的“正确性”被学习后,运用于现实中,却让大多数经济硬实力不够的地方政府举步维艰。曾经有效的经济硬实力维稳,运行至今,越来越失灵了。

(三) 政府社会硬实力动员能力的现实之软

剧烈的城镇化导致剧烈的社会变迁。自共产党建立以来,因党的先进性,党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最为强大的社会硬实力。这种硬实力体制使党在实现路线、方针、政策等目标时,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一方面,党的先进性吸引了其依赖力量——人民大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依赖党领导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村委会、居委会、协会、学会等,使党在动员社会力量时常常得心应手。

然而,剧烈的城镇化大大改变了党领导下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功能。城镇化之后,城乡实现了一体化,大量的农民离乡入城,归入一个个的新社区,原有的“熟人社会”分崩离析,社会群体还原为“原子化”的个体,哪怕是最有组织力的“党小组”也出现了分离现象。更为常见的是,城镇化打破了大量的“单位”,原有的政府动员的基础丧失,而新的依照社区分散的群体其组织性严重不足。

正是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政府社会硬实力的动员能力大打折扣。而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凸现,政府维稳的任务一波接一波,原先有些社会矛盾的化解可以交给党领导下的社会组织,但社会变迁后,有力量分解社会矛盾的社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了政府必须面对所有的社会矛盾,失去了中间的缓冲层,最终导致所有问题的矛头直指政府。城镇化之后,政府社会硬实力的动员能力遭遇了现实之软。

三、软实力的硬：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维稳手段须全面突破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维稳硬实力及其手段运用失灵的时候,在全球范围内对政府软实力的研究及其运用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政府运用软实力来维稳,具有很大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说,运用政府软实力维稳,投入少而收益高,软实力运用得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其“硬”的一方面。

(一) 政府运用文化软实力维稳之硬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起来,国强民富的目标也在实现,民族复兴也在这一轮以城镇化建设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初现端倪。取得的成就如此之大,其原因很多,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华民族有伟大的从未间断过的文化。“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000万~5500万人口),灿烂的文化,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接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是凝聚民心的重要力量,国家利益、长久利益是唤醒公众的强大文化力量,深浸中华文化的中国国民,是创造出改革开放惊世成绩的主体。中国政府所拥有的文化软实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硬”基础。

几千年来延续的传统文化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融合,使中国各级政府已具备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软实力,只不过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是柔性的,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现,而政府官员任期短暂而维稳任务却是急迫的,这才导致政府在维稳中很少使用文化软实力。事实上党内早就认识到文化软实力的硬:“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新型城镇化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得益于我们的文化,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其实也可以从政府文化软实力中去寻找到答案。软实力通过柔性手段,缓和地解决,其力量是硬的,其过程是缓和的。

其实文化软实力不仅掌握在政府手中,也掌握在公民手中。“软实力手段并不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尽管政府支配着政策,但文化和价值观植根于公民中。与经济权力或军事权力相比,软实力的运用似乎风险更小,但它往往难以运用、容易丧失且恢复成本高昂。”城镇化建设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公众的事,城镇化进